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新客、新村與園丘：馬華客家人的家園回憶

New Immigrant, New Village and Estate: Malaysian Hakka Chinese
Memoir of Homelands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3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許維賢(Wai-Siam Hee)

頁數/Page：248-25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3](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新客、新村與園丘：馬華客家人的家園回憶 New Immigrant, New Village and Estate: Malaysian Hakka Chinese Memoir of Homelands

許維賢¹

Wai-Siam Hee

拜讀林玉玲1996年在美國出版的回憶錄《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和近作〈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The China Coda: Hegemons, Empires and Gaps in a Postcolonial Imaginary”)，腦海非常不識趣地浮起父母的臉。把那從沒上過完整正式教育的父母跟「學貫滿盈」的林玉玲相提並論，自己也感到汗顏。然而，我不得不讓他們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在這篇文章裡跟林玉玲相遇，因為父母跟林玉玲一樣都出生於日寇時代的馬來亞，同樣在這片土地上面臨過饑餓和恐慌的戰爭年代。父親跟林玉玲一樣出生於1944年，母親的身分證則是記錄她出生於1943年，母親說這是不實的記錄，因為外婆在日寇政府強制登記的情況下，只好順口虛報母親出生於1943年，以獲取良民證。外婆、外公或爺爺、奶奶都是林玉玲在《月白的臉》筆下那一批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從中國大陸逃到馬來半島的「移民、流動人口和沒有登記的勞工」(Lim 1996: 36)，當時的土生華人把這些勞工稱為「新客」。作為土生華人的林玉玲和其家族，在英國統治的海峽殖民地是英國的屬民，乃屬於她自稱的「在社會中被授予又令人羨慕的階層」(ibid.: 36)。

這兩大群體之間不是沒有共同性。父母的母語跟林玉玲一樣也不是華語，至今母親依舊無法以華語跟我溝通。母親的母語是粵語，父親

1 許維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wshee@ntu.edu.sg

airiti

母語是客語，母親跟隨父親從小與我們幾個兄弟姐妹說客語，因此客語也是我的母語。少年離家出遠門讀書後，客語在外面世界派不上用場，只在回鄉跟父母溝通，才需要說客語。多年在外，導致我對客語日漸生疏，拿起電話跟母親說話，日漸發現自己詞窮，已經無法以客語完整表達出來，夾雜那些華語、馬來語和英語詞彙，經常令母親聽不懂我在說什麼，那真的是屬於我輩破碎的鄉音。不可能再回到童年以親密的客語，躺在她懷裡撒嬌。近年我發覺自己日漸不得不在電話中提高嗓子把客語叫喊出來，母親才聽得見，我必須接受七十多歲的母親日益逼近耳聾的現實。林玉玲成長以後就沒有再以自己的母語福建話跟家人溝通 (ibid.: 59)，然而我對自己日漸失去掌握母語的事實感到歉疚。父母除了會寫下自己那幾個歪歪斜斜的中文名字和幾個數字，基本上不具備其他的書寫能力。趁父母還能說話，我還能聽得懂客語，近年我努力以彆扭的客語跟父母敘說往事，我有義務趕緊把那一代人的故事記錄下來。

我出世的時候，爺爺、奶奶和外公已去世。根據我爸的口述，爺爺、奶奶從廣東來到馬來亞，輾轉流離一段日子後住在華玲(Baling)一帶的鄉野裡，那是1955年馬共和英殖民政府談判的據點。1948年在英殖民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後，爺爺、奶奶辛苦搭建的木屋，一夕之間被強制拆遷，一家幾口被遷移到遠離山區的集中營裡，俗稱新村。這些還需要臨時出動村民搭建的新村，設備和環境都非常糟糕，村民往往住不下去了又得廢置，另外再尋找適當的據點搭建可容自己棲身的集中營。在父親的童年記憶裡，那段期間村民們顛沛流離，往復搬遷了幾次，最後才在吉輦河(Kerian River)上游的新村裡正式落戶。村裡幾乎超過一半的村民失業，我爸和大伯從小跟隨這些失業的村民們一起賭博，習得了一身賭藝的本領。據姑姑說，寫得一手好書法的爺爺，經常手拿藤條，追打鎮日賭博的大伯和我爸，但是經常在我爺爺來到之前，我奶奶已私下派遣矮小的小姑，跑去跟大伯和我爸通風報信。至今我爸還跟很多人不斷埋怨，他青少年時代協助爺爺割膠的血汗錢，每月都被爺爺寄回廣東接濟鄉親父老，乃至自家一貧如洗。這導致我爸對中國沒有哪怕一絲的懷念，即使他是新客的後代，這點反而跟林玉玲對中國強烈的排斥感有互通之處。

那些年我持著獎學金去中國留學。畢業旅行，大學當局免費安排

外國留學生坐火車到桂林旅遊。在車上，當局要求每個國家的留學生都要唱一首能代表自己國家的歌曲助興。車上有來自法國、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的各國學生，他們都以各自國家的語言唱歌。輪到我和另外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華裔留學生，我們要唱一首大馬歌手創作的華語歌曲，當局卻說一定要唱馬來語歌，這才能代表馬來西亞。僵持了一段時間，我們只好面無表情地唱起馬來西亞的國歌，彷彿回到小學和中學時代的週會，驟然感到肩背流下冷汗，為何中國人在中國場域否定我們唱華語歌曲的正當性？中國人又在暗示我們什麼嗎？他們只是把華語和中文借給我們使用，但這個語言永遠不屬於我們，我們僅是在鸚鵡學舌。有一次一位新加坡國籍的華人跟中國教授交談，我這位新加坡同學僅爲了表示對這位中國教授的親切，談話中以「國內」來指涉中國，中國教授一臉愕然提醒這位同學，你是新加坡人，你所謂的「國內」應該是指新加坡，而不是中國。

時下全球主流的中國學研究、亞洲研究、離散華人研究或華語語系研究，在這個脈絡下也包括林玉玲的論述(Lim 2015: 131-132)，總是傾向於擔憂馬華鮮明的華人性(Chineseness)有被中國論述挪用和收編的嫌疑，然而這實在是過慮了，因爲中國人從日常生活到很多制度的設計早已經把我們當外國人看待，也經常希冀我們以外國人的身分在中國人眼前展示帶有異國情調的馬來西亞性，而不是華人性，這讓我們在中國感到無所適從，也啼笑皆非。在北京致電母親，跟她分享我那充滿疏離感的新中國經驗，卻再次感到自己母語的支離破碎，母親已經不太聽得懂我那五音不全的客語。沒有一種語言是屬於我的，包括我那日漸流失鄉音的母語。

母親在馬來亞的近打谷(Kinta Valley)出生，那正是馬共領袖陳平《我方的歷史》和歐大旭(Tash Aw)《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筆下馬共成員活躍出沒的中心地帶。當林玉玲在成長時期進出教會學校在英語科目獨占鰲頭時，母親和她的幾個姐妹們凌晨就必須離開新村，提起膠刀騎著腳車載著膠桶進膠林工作了。母親的幾個姐妹都曾在割膠中接濟馬共黨員，後來都被逮捕坐牢，作爲外婆獨子的小舅被迫提早休學，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對此他餘生充滿怨言。這幾個姐妹正是林玉玲筆下那些她在成長時期「憎恨的華裔共產黨」

(Lim 1996: 40)，然而她們不具備林玉玲在成長時期所以為的「華人認同等華文沙文主義」(ibid.)，因為這幾個姐妹們除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並不懂得書寫華文，母親在工作之餘還勉強在新村上過幾個月以粵語教學的夜校。我小時候第一次接觸到詩詞，是母親在昏黃的電石燈下以粵語要我跟著她念著信箋裡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跟這幾個姐妹的感情很好，早期母親也許因為這樣投射了她對馬共的同情以及對新中國的美好想像。外婆家的書櫃殘留一些新中國早期出版的畫報，母親早期堅持不丟，僅是把它們藏起來。那一代人跟林玉玲那「害怕看到說華語的人」(ibid.)的心理完全相反，母親看到說英語的人就心驚膽跳，這些人都是膠園的大財主和臣子，他們拍板決定要不要繼續聘用母親和其他員工繼續割膠。1960年代下半葉，當林玉玲在馬來亞大學讀書，周旋於兩個不斷爭風吃醋的教授的時候(ibid.: 125-132)，母親在近打谷失業了，她不得不離開家鄉，跟隨印度人去到更偏遠的園丘割膠，就是在那裡他遇見了我爸，婚後生下我大姐，交給遠在新村的婆婆撫養，然後兩人回到園丘繼續割膠。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後，林玉玲持獎學金赴美留學，父母逃離頻臨暴亂的園丘，回到新村後又找不到工作，後來還是懷著恐懼回到園丘，在1973年生下了我。

我的童年在這片遠離市區的園丘渡過，那裡也是馬共領袖在回憶錄裡提及馬共黨員出沒然後被槍殺的所在地。屬於英國屬民的地主擁有這座種滿橡膠樹、椰樹和可可樹的園丘控制權，他僱傭了百名勞工，並在園丘了蓋了兩房一廳的房子，租給這些勞工們，大部分是印度人和馬來人，僅有幾戶華裔人家，我不到六歲，大部分華裔住戶也搬走了，僅剩下我家和隔鄰的華裔寡婦。園丘大樹下有一間小小的診療所，由一位僅僅英語的印度裔醫生獨自掌管。作為勞工的孩子，每逢生病，父母的第一句反應就是「我們又欠了醫生的錢」，再來就是去到診療所，聽不懂印度裔醫生的診斷，要去城裡找華人醫生看，又要花多一筆交通費。

父親患上腦瘤後就失業了，動了手術，餘生留下後遺症，左眼紅腫凸起，失業的日子長期靠賭博為生。成長時期我才漸漸知道父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曾持著紅色的身分證，以非公民的身分跟我媽結婚並

生下四個孩子。²年輕的時候因為他不熟諳馬來語，又沒錢疏通那些官員，申請馬來西亞公民權處處碰壁，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很難。父親至今也不清楚為何自己半生持著紅色身分證，曾跟父親一樣持著紅色身分證的小姑跟我說，那很可能是因為1957年前後當馬來亞政府開放公民權讓華人申請，我爺爺決定攜家帶子回中國，因此沒有幫我爸和小姑申請公民證。我奶奶卻堅持要留在馬來亞，跟我爺爺冷戰幾年後，我爺爺最終病逝馬來亞，至死沒有回到中國。

童年的園丘裡僅有淡米爾語小學，父母把我們送到市區的華文小學就讀，每逢開學都令我們折騰。除了要繳交學費和雜費，也要提交申請借課本的資料，校方僅允許收入低於下限的父母孩子借取課本，不然需要付一筆費用買課本。父母需要奔走園丘行政處的上下機關，獲取一封證明父母收入低於下限的正式文件，不懂英語的父母經常碰了一鼻子灰。父親一生最「風光」的壯舉，大概就是靠賭博賺來的三萬多元，在沒跟母親商量的情況之下，一口氣以現金買下新村的一棟板屋，在我十歲的時候舉家搬回在吉輦河上游的故鄉。在那裡落戶了，才發現板屋沒有地契，每年需要向一位華裔財主繳交地契租金。

父親在那裡住下後，至今都堅持不肯搬去城裡孩子的花園屋。大概在他看來，一生從新村到園丘，再從園丘回到新村已經夠了。新村裡有他的死黨，要他從新村搬到陌生的花園，他是抵死不依的，再說城市裡的花園屋總自稱是「花園」，也沒長出幾根花草。³每年舟車勞頓回鄉過年，父親總是指著電視上某位口操馬來語間雜英語的馬來部長罵道，他的英語很差啊。父親不懂英語，不明白他依仗的是什麼。那些年我在中國留學，母親每逢去外婆家拜年，都備受小舅和舅母的冷嘲熱諷，小舅大概一生受夠了一家幾個姐妹被馬共牽累，他們一家人和很多人一樣，就是不看好我從中國畢業後能幹些什麼，小舅和舅母不斷炫耀她的女兒去荷蘭「跳飛機」，然後在那裡結婚生子，

2 紅色身分證是馬來西亞永久居民的身分象徵，沒有投票權，屬於非公民群體。

3 大馬城市的住宅到處以「花園」命名，花園在馬來語叫Taman，即英語Garden的意思。

現在成了當地居民：「一家幾口還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呢！」母親重複轉述小舅的這番話給我聽。⁴

父母和小舅這一代人跟許多新馬的新客後代一樣，尤其是早期新加坡那佔了大多數人口的華校生，一輩子在英殖民地和獨立建國後的後殖民時代吃了不熟諳英語的苦頭，然後餘生在「由華入英」的大趨勢下，又要面臨不斷被強迫學好英語的詢喚，也許大家都能感同身受林玉玲說的英語不是單靠苦學就能熟諳，還要仰賴天份(ibid. : 73)。當大家知道自己餘生無法熟諳英語文，又根本無法抵抗它的時候，最後也只能膜拜那些在英語帝國下不斷往上爬的高級華人，不斷仰望英語帝國的通天塔(Tower of Babel)，其峰頂當然是精純，摒除一切鄉音和在地口音，以英美母語的精純英語為崇尚，不斷渴望它，不斷慾望它，也不斷通過在明在暗的互相比較、互相監視甚至互相歧視那些比自己更差的其他華人的英語程度，從而讓各自的心理創傷得到變態的治療。當熟諳英語在全球化的時代成為個人成功的基準，「不懂英語」被全球化的英語帝國不斷挪用作為亞洲下一代的教材和警戒的時候，不懂英語的群體在這個脈絡下當然已經被收編或晉升成為英語帝國的子民，那是最底層的子民了，可能也是最忠誠的良民之一。這些原本「不懂英語」的後代子民，眼下已遍布全球，從遍地都是新東方的中國，一直到全民狂學狂講英語的新加坡，以及到處林立國際學校和英語補習中心的馬來西亞，英語帝國的子民比比皆是。

如果父母真的認識林玉玲，也許林玉玲也會是他倆崇拜的偶像。

引用書目

Lim, Shirley Geok-lin. 1996.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Lim, Shirley Geok-lin. 2015. "The China Coda: Hegemons, Empires and Gaps in a Postcolonial Imaginary," in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1(1): 121-139.

4 所謂「跳飛機」是大馬華社民間俗語，即在異國非法居留工作。